

纪念中国近代史开端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

#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

李吉奎

〔摘要〕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,中国开始了近代化进程。在半个多世纪时间里,作为一个先进的中国人,容闳为追求国家政治民主化、经济工业化和教育科学化,进行了不懈的努力,有着突出的贡献。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化先驱者。

〔关键词〕容闳 近代化 西学东渐记

近代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内部进程。在中国,这个进程可说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正式开始的。追求政治民主化、经济工业化与教育科学化,是百余年来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。为实现中国近代化而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中,广东香山人容闳,占有突出的地位。

从1860年到天京向太平天国领导人建言改革,到本世纪初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,容闳经历了他所处的时代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,与洋务派、维新派、革命派的许多重要领袖人物都有过交往。这种无与伦比的经历,充分反映了他致力于国家近代化的心志与实践,也具体表现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曲折、坎坷。

容闳于1841年在澳门进马礼逊学校,翌年随校迁香港。1847年赴美国,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,是“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第一等大学者”<sup>①</sup>。容闳少小离乡,受自由主义教育学成归国。他进大学时,拒绝接受保证毕业后从事传教的奖学金,认为学完后无论何业,将其择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,为中国谋福利,“纵政府不录用,不必遂有大为,要亦不难造一新形势,以竟吾素志。”他的素志,是“以西方之学术,灌输于中国,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。”容闳的朋友说,“他热爱中国,信赖中国,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,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。”这是颇中肯綮的评论。他对国家情况是了解的,据他回忆:“当修业期内,中国之腐败情形,时触予怀,迨末年而尤甚。每一念及,辄为之怏怏不乐。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。盖既受教育,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,而道德之范围亦广,遂觉此身负荷极重。”为祖国前途计,他还是毅然返国,报效同胞。

容闳虽然有美国名牌大学的文凭,但是他没有中国的功名,要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起作用,还是极其困难的。1855年他回到国内,先后在广州、香港、上海等地居住,补习中文,在外国使馆任书记,学习法律,做海关译员,做买办,在苏浙等省收购生丝、茶叶。社会实践使他增长历练,也使他认识社会。他得出这样的结论:清政府实际是一个极大的欺诈机关,没有洪秀全,中国也难免于革命。他甚至曾考虑投奔太平军。在1863

本文1990年7月8日收到。

年以前,这位留美返国的青年人,不但未能一展怀抱,实际是在为衣食奔走。

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,蒙受了耻辱,但统治者昧于世界大势,不吸取教训,不思振作,使中华民族愈来愈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渊。容闳主张向中国灌输西方学术,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,较之于魏源以夷制夷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,无疑要进步得多,直至半个世纪之后,孙中山仍提出“取法西人文明而用之”<sup>②</sup>,其意亦与容闳之说相通,是积极进取的观念。

当容闳回到祖国时,中外已订立了第一批不平等条约。通商口岸及沿江沿海一些地区,已开始半封建半殖民地过程。士大夫阶层感受到国家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局,思有应变之策。地主阶级改革派开始抬头,主张经世致用的人转变为洋务派。容闳未受系统的儒学教育,也不受体用问题的困扰,遂毅然以使“西学东渐”,根据实际环境,从事近代化活动为己任。

容闳在香港时,认识了洪仁玕。1860年,他到天京去见洪,这时受封干王的洪仁玕正总朝政。容闳向他建言七事,内容是:一、依正当之军事制度,组织一良好军队;二、设立武备学校,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;三、建设海军学校;四、建设善良政府,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,为各部行政顾问;五、创立银行制度,及厘订度量衡标准;六、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,以耶教圣经列为主课;七、设立各种职业学校。容闳表示,以上各端仅是大略,如能采纳,愿为马前走卒。但是,太平天国领导层未能接受施行,容闳也就告别而去。他认为,太平天国在中国政治上“绝无革新之影响”,不过,“天假此役,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,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,而有新国家之思想”,给以一定程度的肯定评价。容闳的建议,涉及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及教育各方面建设近代化国家的主要部分,除了议会制度未叙及外,这是一个完整的近代化纲领。与之相较,结集于1861年底的冯桂芬的《校邠庐抗议》,虽不乏对现行制度(如薄俸、繁文缛节、衙门吏役及基层政权建设等项)的改革建议,但深度与广度都无法与上述建言七事相比。容闳此举,是中国人对国家改革最早提出的建议(虽是对太平天国政权);比赫德的《局外旁观论》(1865年)、威妥玛的《新议略论》(1866年)也要早。早期改良主义者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,1860年的中国虽然尚未有民族资产阶级,但容闳以其所受教养和思想意识,无疑具有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世界观。他的建言七事,是超前的资产阶级的改革要求;他的改革意识,显然领先于他的早期改良主义者同侪。

天京之行未能实现其改革计划,他只得在九江经商,一待三年。但他认为,“余既志在维新中国,自宜大处落墨,若仅仅贸迁有无,事业终等于捞月。”于是伺机而发。1863年他终于等到了机会,受知于当时任两江总督兼办四省军务的曾国藩。曾氏驻节安庆,他在1861年攻陷该城后,设立安庆内军械所,试造枪炮炸弹,收罗了一批著名的科技人才如李善兰、徐寿、华蘅芳等,开始引进西方科技,建立近代工业,它与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的三所洋炮局,成为洋务运动的开端。容闳就是在这个背景下,通过李善兰等人的介绍,被曾氏招往安庆会见的。曾、容谈了几次,容除了建议首先创设制造机

器之机器即母厂之外，其余未曾多言。不过这次会见为容闳以后的活动创造了条件。

1868年，容闳在江苏抚署拜会丁日昌。从李鸿章在上海办洋炮局开始，丁日昌即具体参与，丁不断向李条陈办洋务的重要事项，李“采用丁日昌条议，益购机器，募洋师，设局制造，颇渐窥西洋人奥函”<sup>③</sup>。对于这位近代化的实践者，容闳引为知己，称他“为人有血性，好任事，凡所措施，皆勇往不缩”。在会见中，容向丁谈到教育计划，丁表示赞许，促“速具详细说帖”。容赶回上海，撰为条陈四则，由丁转寄北京。条陈内容是：一、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，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，不许外人为股东；二、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，送之出洋留学，以为国家储蓄人才；三、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，矿产既经开采，则必兼谋运输之便利，凡由内地各处以达通商口岸，不可不筑铁路以利交通，故直接以提倡开采矿产，即间接以提倡铁路事业也；四、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，以防外人之侵入。在这四条中，第一条实际是开设轮船招商局的先声，开矿筑路也是近代化的基本内容。对教会申禁，是防止民教冲突的手段。而派遣留学生，则是建议的主旨。据说这个条陈并未寄往北京转奏，致使他希望几绝。本文第三部分还要讲到，1871年，容闳终于得到曾国藩、丁日昌等人的支持，实现了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计划。但是，这一重要举措，竟被破坏，留学生撤回。经此挫折，容闳深刻地认识到，“中西文化，判若天渊；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，认为不容稍缓之事。”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觉悟，当洋务运动的成效以甲午战争之败告分晓、维新潮流涌来时，容闳与王韬、郑观应等人一起，加入了维新派行列。

从1882年至1894年，容闳旅居美国。甲午战争爆发后，容闳给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写信，提出建议：一、中国向英国借款1500万元，购买铁甲舰，雇洋兵5000人，由太平洋抄日本后路；二、将台湾抵押给西方一强国，借美金4亿元，作为战费。张之洞采纳了第一个建议，派容闳接洽谈判，据说已有眉目，但因以关税作押，事为赫德及李鸿章所沮。随后，张电招容闳立即回国。

洋务运动未能使国家富强起来，维新运动日益高涨，在这种形势下，容闳来到南京，张之洞询问他：“中国新政，当用何策补救？”容闳回答说：中国不欲富强则已，苟其欲之，则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，决不能恢复其原有之荣誉。“所谓新政策，政府至少须聘外人四员，以为外交、财政、海军、陆军四部之顾问，与之订立十年合同。十年后若有成效，则更继续聘请。惟所聘之顾问，必须有真确之经验、高深之学识、纯洁之品行而后可。既聘之后，其所陈之嘉言良策，政府当诚意采纳，见诸实行。此外更派青年有才学之中国学生，处于各顾问之下，以资练习。如是行之数年，则中国行政各机关，不难依欧西之成规，从新组织也。”他认为，舍此办法，别无救亡之良策。对这个意见，张之洞未置可否，只是派他充个“江南交涉委员差使”。

张之洞没有重用容闳，但容闳并未减弱自己的努力，他游说政府，相继提出《请创办银行章程》、《续拟银行条陈》及《铁路条陈》<sup>④</sup>。这些建议仍未受重视。1898年，他住在北京，积极参加变法运动。他在北京的寓所，一时几成为维新党领袖的会场<sup>⑤</sup>。政变发生，因有隐匿党人之嫌，他不得不逃出北京，奔赴上海，在租界里住下来。1899年，为安全计，他又转往香港。

在上海时，容闳可能与唐才常建立了联系。1899年11月，在日本与孙中山、梁启超

均有交往的唐才常回到上海,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。1900年3月,容闳到新加坡,会见康有为,此行可认为是容闳代唐才常做说客,促使康与孙中山结盟。但没有取得突破,倒是容、康一起向新加坡英国当局透露了一个消息——1900年5月底中国将有大事发生。容闳提出:“假如发生起义,英国政府是否愿意支持?”<sup>①</sup>3月底,容闳在香港会见兴中会成员谢纘泰。他们同意“在能干的基督教徒领导下而联合与合作”。谢写信给孙中山,劝他会见容闳,并安排容与杨衢云见面。谢还强烈推选容闳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,以防止各党派领导的自私竞争和妒忌。容闳于4月4日离港赴上海活动。<sup>②</sup>

在上海,唐才常将正气会改为自立会,并于7月1日在上海愚园召开国会,容闳与严复、章太炎等各界80余人出席,容被推为会长。“容公向大众宣讲宗旨,声如洪钟,在会人意气奋发,鼓掌雷动”<sup>③</sup>。容任外交事务,起草对外宣言(英文),内称:“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”;又称本会宗旨“端在复起光绪帝”;它还表示要“立廿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,以立宪自由之政权与之人民”,对外人的生命财产、租界、教堂均力为保护<sup>④</sup>。这种观点反映了容闳当时的思想状态,他虽然与革命党有联系,但迄1908年与康、梁仍关系较密切。他不是理论家,思想缺乏深度,虽然在致力于国家政治近代化,但还未能能在君宪与共和之间作出抉择,从主流看,还是赞成君主立宪政体。

张之洞镇压自立军后,指名缉捕首事诸人。容闳与堂弟星桥<sup>⑤</sup>于9月1日乘“神户丸”离开上海赴日本,在船上与孙中山相遇,一同到长崎。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,孙与容星桥过从甚密,并与日本人犬养毅、中村弥六、内田良平等会晤。约9月中旬,容闳赴香港。这次会见,对日后容闳支持孙中山反清革命,有极大作用。早在8月22日,孙中山在离日潜返上海时,曾在横滨对人说,他们所拥护的领袖是容闳,孙本人正在与李鸿章及南方一些督抚及康有为派相联结,策划政治改革,并打算为此效力<sup>⑥</sup>。在10月间孙中山致函上海刘学询,主张在未来建立的政府中推容闳处理外局,出使外国。此时,容闳可能参与了兴中会的活动。<sup>⑦</sup>

1902年,谢纘泰、洪全福等准备大明顺天国起义,约定事成推容闳为总统。不过没有资料证明他参加了此次密谋。1902年,他重赴美国。随着国内形势发展,他逐渐转向革命。1907年9月,他致函谢纘泰,提出促使中国革命成功的计划。到翌年7月,他终于结束了与康梁的关系,在致谢纘泰函中“建议维新党联合起来,并且谴责康有为及其保皇会”。他还致函美国人波司,指出康有为声誉低落,已非一安全可靠的革命运动者。为策划革命运动,他与荷马李、波司、孙中山之间建立了一种磋商关系,并承认孙可控制国内局势。1910年1月,容闳向波司提出一个“中国红龙计划”,即需要500万美元、10万支枪、1亿子弹等。1910年2月16日,他以书面形式向孙中山提出与荷马李等进行谋划的“红龙计划”的实施步骤,具体办法是:一、向银行贷借150万至200万美元作活动基金;二、成立临时政府,任用有能力者以管理占领的城市;三、任用一有能力之人统率军队;四、组织海军<sup>⑧</sup>。围绕实施“红龙计划”,孙中山、波司等人还举行洛杉矶长堤会议,筹款起义。4月5日,孙中山与容闳会晤,有所谋划。他们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,但表明容闳身在异国,仍以垂暮之年关心中国革命事业,从一般意义的爱国、救国,转变为共和革命立场,为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,继续努力,

## 二

经济近代化,是将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转入资本主义轨道,这是19世纪后半叶中国应走的道路。但是,当时并没有多少人认识到这点。正因为如此,容闳的贡献尤其值得重视。

安庆内军械所与上海洋炮局,规模都很小,设备也简陋,完全不适应当时的军事需要,李善兰等人是在考虑设立“西式机器厂”的情况下推荐容闳的。但容闳的意图,不是直接建立生产军械的工厂,而是先建“母厂”,并向曾国藩说明:应先立一母厂,再由母厂以造出其他各种机器厂。予所注意之机器厂,非专为制造枪炮者,乃能造成制枪炮之各种机械也。用今日观念理解,就是先发展重工业中的机器制造业,即发展基础工业,提供生产设备,这路子是正确的。曾氏采纳了他的建议,派他到美国购置机器设备。容闳得助于美国机械工程师哈司金,花了68000两白银<sup>④</sup>,于1865年买回一套当时被认为是好望角以东最好的机器,装备了在洋务运动中建起来的第一个大厂江南制造总局。1867年,容闳陪同曾国藩参观这套机器的运作,曾氏“见之大乐”,乘此机会,容闳建议在厂旁设立兵工学校,招生徒肄业,授以机器工程的理论与实验,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。曾氏极为赞许,于是设立制造总局的兵工学校,造就了大量机械人才。这所职业学校,实际是1860年容闳向洪仁玕建议“多设职业学校”的实践。论者或谓:由于容闳倡议,1867年局内设翻译馆,十余年间,译书一百余种,区区一局,遂成洋务之重镇,遗爱无穷,纯甫(容闳字)之力耳<sup>⑤</sup>。尤其是,该局编纂《西国近事汇编》,自1873至1899年间,每年出4册,计出108册,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及各国情况作了较系统的介绍,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,具有较大的影响<sup>⑥</sup>。上述举措的实施,比1868年明治维新为早,若举国开通,本有望达“借法自强”的目的,但终未遂所愿,且国势每况愈下,其中原由,实在值得后人反思。

容闳与丁日昌,即是在丁任江南制造总局督办时结识的。其后丁任上海道、盐运使及苏抚,两人交谊日密。如前所述,1867年在丁鼓励下容闳进条陈四则,其中招纯华股设轮船公司,实为1872年创办招商局的先声,它揽载漕运,在沿江沿海招客货运输,不仅利国便民,也是对洋人轮船的竞争。李鸿章说过,招商局事业实为开办洋务40年来最得手文字。追原厥功,应首推容闳。1867年,李鸿章附呈藩司丁日昌创建轮船水师条款,所议各情及变通旧制思想,也是参酌了容闳意见。

随着经济发展,煤铁进口量越来越大。开发矿业,是所有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家所大声疾呼的要求。但是,以开采矿业带动兴修铁路,改进交通运输,始议者却是容闳。他在1867年条陈中提出来,到1872年,李鸿章才有改“土车为铁路”的建议;但“闻此议者,鲜不咋舌”<sup>⑦</sup>。直至1881年2月14日的煌煌上谕中还宣布:“迭据廷臣陈奏,金以铁路断不宜开,不为未见。刘铭传所奏,著毋庸议”<sup>⑧</sup>。这时上距容闳提出修铁路建议,已过了14年。14年中见识居然毫无长进,亦可见廷臣之颛顛与朝廷之昏聩。

发展近代化经济,金融机构银行的设立是必不可少和不可须臾缓的。列强在通商口岸已遍设银行,而中国依然是钱庄、票号存续,反差之大,不可以道里计。1896年容闳

提出,取法美国,在北京设立国家银行。他说通张荫桓(户部左侍郎、总署大臣),张在容计划上斟酌损益,交户部尚书翁同龢。翁、张意见相合,并征得部中僚佐支持,拟折上奏,筹1000万两开办费,迨将来中国商业发达,则国家银行亦随商业发达的比例,逐年增加资本,先设总行于北京,在各省城及通商口岸续设分行,并印发钞票,兼管铸造。清廷已批准这个奏议,但为盛宣怀所破坏,未行。1904年,户部银行设立,作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执行业务。从1860年容闳建言设立银行,到户部银行成立,时间已过去43年,西方世界已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,其间中国竟未发行钞票,也没有中央银行代表国家以作金融中心机构,经济近代化进程之迟缓,真是不可言状。由此,亦可概见容闳对此领域的重视所具有的价值。

甲午战争以后,列强疯狂地在华划分势力范围,争夺筑路权。为了维护国家权益,容闳于1896年提出铁路条陈,建议“变通招股”办法,借力于美国,将“所有畿东、滇南、川广、芦汉、苏杭、淞沪等处,同时并筑”,“如有华商愿出资本,并归公司合办”,通盘合计,不出五年,一律筑成。还应给与事权,造就人才,初建时聘洋人,“惟将来路须归官,生手如何接办,必须务先造就”,办法是设铁路学堂。1898年,他又上天津铁路条陈。但清政府不允以铁路让与外国公司承造,要他“必招中国资本,不许外人入股,且六月之内不能招齐路股,则将特许权取消”。若全由华商认股,以兴修铁路,殆如登天之难,所以只得将此计划作废。他拟借美资修路,虽办法未必尽善,但也有先例可循,而以六月为限集华股,则迹近刁难,计划之无成,可以认为是执事者根本排斥其主意。

上海机器织布局是李鸿章的洋务事业之一,它的创办,有抵制进口机制纱布倾销之意。1880年,郑观应负责该局事务,以容闳“留心实学”,要他在美选聘有经验有名望的洋匠到沪商办。他代聘美国技师丹科,于翌年8月来华,经试用考核合格,派赴美国购置机器,完成了任务。<sup>①</sup>

据许芹牧师回忆,容闳关心科技进步,至老弥切。他到教堂聚谈,关切国事之余,对工程与机器发明特具兴趣<sup>②</sup>。民国成立,他不能回国,犹嘱其二子颢槐、颢彤弃所营业,回助祖国<sup>③</sup>。二人从父命遽返唐山。二次革命前,容颢槐任职广东都督府兵工局长,为革命政权服务。

综上所述,可知容闳对有关国家经济近代化的各方面,举凡路矿、银行、航运等各部门,均极力提倡,他本人虽不是科技人员,但奔走呼吁,不遗余力,屡经挫折,其志仍坚,为近代化进程起了重要作用。

### 三

容闳是“教育救国论”者。他对中国近代化所作的最重要贡献,是在教育科学化方面。

近代以来,不少士大夫主张引进西学(新学)以济中学(旧学)之不足,这是向西方学习的主要愿望,不过具体如何学习,说法不同。容闳强调从教育入手,他说:“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,藉西方文明之学术,以改良东方之文化,必可使此老大帝国,

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。”随着洋务运动开始，兴办近代企业，对人才的需要非常迫切，学习西方科技文化，成了时代的要求，容闳的观点，不仅具现实感，且具前瞻性。

容闳所重视的，首在铸造灵魂。他指出：“人必受教育，然后乃有知识，知识即势力也”。知识就是力量，这是西方的名言。容闳现身说法，说他“既受教育，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，而道德之范围亦广，遂觉此身负荷极重。若在毫无知识时代，转不之觉也。”换言之，有了知识，才有力量，才有道德，才知道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生存的价值。这种理念，与后人强调教育的德、智、体、美四育，意义正复相同，在强调三纲五常的时代，容闳所宣传的教育思想，当使人耳目一新。他还是我国最早提倡职业教育的人。创办职业学校，培养各级技术人才，是经济近代化不可或缺的途径。他提议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兵工学校，议而未设的铁路学堂，均属此类教育。江南制造总局兵工学校，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技工（职业）学校，这个史事，不应湮没不彰。

对于高层次教育，即派留学生出国就读、深造，是容闳最为注意的事业，他返国之初，即有此意。1863年初，他受曾国藩垂询而未献议。1867年的四则条陈中，他明确提出选派优秀青少年出国留学，为国储才。派赴目的地是美国。具体办法，初次先定120名以试行，分为四批，每年送30名，以15年为留学期限。学生年龄在12至14岁为度。视第一、二批学有成效，以后永定为例，每年派出此数。同时派出汉文教习，使他们可兼习汉文。学生的宿膳入学等事，另设两名留学生监督以管理。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，提拔数成以充用。这个方案呈交总署后，据说由于文祥丁忧，未及研究。

1870年，容闳作为清廷处理天津教案大臣曾国藩、丁日昌等人的译员，乘事毕人未散时，提出选派留洋学生的事。曾等四大臣允许联衔入奏。10月10日，奏请选派聪颖子弟赴泰西军政书院，分门学习。翌年6月，曾、李致函总署，论派幼童出洋肄业的重要。1872年2月，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复函李鸿章，欢迎中国幼童赴美肄业。5月，总署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，以陈兰彬、容闳为该局常设在美国的洋局的正副委员。8月，第一批赴美学童（包括詹天佑、梁敦彦、蔡绍基、黄开甲等）由陈、容二人率领自上海启行<sup>②</sup>。中国政府终于第一次突破夷夏之防，向被它视为夷狄的西方国家派出留学生。容闳慨叹：“至此，予之教育计划，方成为确有之事实，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，特开新纪元矣”。

第四批学童在1875年派出，满120名之数，以哈特福德市为中心，分送美国各级各类学校肄业。是年12月，清廷任命陈、容二人为中国驻美、西、秘三国正副公使，容闳不欲离开留学生副监督岗位，谓“以教育计划言，是予视为最大事业，亦报国之唯一政策”，因此请求清廷收回成命，“俾得仍为学生监督，以期始终其事”。但国内“不准不驳，亦允亦否”，容仍以副公使兼监督，在留学生工作中有权调动一切。

但是到1876年，容闳培养留学生的计划终于失败了。1876年，吴嘉善（子登）任留学生监督，此人视学生留洋“为离经叛道之举”，他“揎掌撝袖，准备破坏新政，以阻中国前途之进步”，与陈兰彬等一起，“造为种种谣言”，谓容如何不尽职，如何纵容学生，任其放荡淫佚，“此等学生，若更令其久居美国，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，他日纵能学成归国，非特无益于国家，亦且有害于社会，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，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，撤回留美学生。”对这种诽谤，容闳曾经申辩，包括耶鲁大学校长等许多

美国教育家及大学校长,也联名致函总理衙门,“思有以阻止中国为此退化之事”,但未收效果。1881年,撤销留学生事务所,这些留学生遂皆“凄然返国”。等到中国政府认识到必须多派学生出洋留学时,已经是庚子义和团运动以后的事了。

留美的120名学童,返国时第一批离15年期限尚有6年,其余大多数在大、中学肄业,有26人早撤或病故,只有詹天佑、欧阳赓在耶鲁大学毕业<sup>②</sup>。他们回国之后,“分派各处当差,均能始终勤奋,日进有功”<sup>③</sup>;后来从事政府部门、铁路、煤矿、医务、教育、新闻、商业、银行、海关、海军、电报等工作,“强半列身显要,名重一时”。这是一批精英,在清末民初为国家做了大量工作,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些新气象。

向美国派遣留学生,是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。这项事业的挫折,说明即使是如此有限度的西化,也是顽固势力所不允许的。李鸿章或许是不了解真相,他也未能坚持不撤的意见。尽管如此,中西文化的正式交流毕竟开始了,而且事实证明是有成效的。顽固、保守势力企图深拒固闭,可得逞于一时,终将失恃。容闳对于此事亦颇自许,谓其此“教育计划告成,而中西学术萃于一堂”,从开创意义上来说,它是有道理的。所以人们在翻译他的传记时,名之为《西学东渐记》,即系纪念他筚路蓝缕之功。

容闳主张中国外交近代化,反对由美国人蒲安臣在1868年充任中国“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”率中国使团赴欧美交涉订约。他还主张开通民智,以促进改革,在1874年倡议开办了上海近代第一份民间报纸《汇报》,成为上海发行日报的先导。该报每日必载新闻目录,使读者一目瞭然<sup>④</sup>。事属开辟,功不可没。

容闳最后约十年岁月,是在美国度过的。1912年元旦,中华民国诞生,这位在太平洋彼岸的“老同志大发欢悦之声”。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写信给他,告以民国建设,在在需才,“素仰盛名,播震环宇,加以才智学识,达练过人,用敢备极欢迎,恳请先生归国。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,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”<sup>⑤</sup>。他似乎未收到这封信。他给谢纘泰写信,告以要防止袁世凯控制政府,防止列强干预中国政治,防止革命领导人的内争,“应该立即组织并成立临时政府,以便开展工作,并使社会秩序和治安恢复正常状态。”<sup>⑥</sup>他希望建立一个“模范的共和国”。1912年2月2日,他给孙中山发出贺电,还收到孙的一帧相片。容函告谢纘泰:希望看到孙当选下届大总统,他已为中国和中国人奋斗了22年之久。但是,他未能看到这一天。1912年4月21日,容闳以84岁高龄逝世于哈特福德市寓所,翌日,《哈城日报》发布的消息,称他是“学者、政治家和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”。盖棺定论,可谓知人。

容闳以其对中国近代化的杰出贡献而名标青史。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,值得中国人民永远纪念。

〔责任编辑(兼职):邱捷〕

#### 注:

① 容闳.西学东渐记.长沙:岳麓书社,1985.67 本篇引文凡未注出处者,均系引自此书。

②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.孙中山全集.第1卷,278

- ③ 薛福成。庸庵文续篇。卷下。19
- ④ 汤志钧。戊戌变法人物传稿(增订本)上册。北京:中华书局,1982。188—189
- ⑤ 西学东渐记。156 据说,百日维新期间,容闳任外交事务参事。
- ⑥ [澳]黄宇和。三位流亡的理想主义者:容闳、康有为及孙中山(1894—1911)。见: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(第12辑)。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9。311
- ⑦ 谢缙泰。中华民国革命秘史。见: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。广州:广东人民出版社,1981。308—309
- ⑧ 孙宝琳。日益斋日记。见:戊戌变法人物传稿。(增订本)上册,189
- ⑨ 冯自由。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。第1册。台湾:世界书局,1954。67—69
- ⑩ 旧说(如革命逸史)均谓容星桥为容闳之侄。但据容启荣致《中外杂志·两地书》编辑函,称乃父星桥原名开,启蒙时名耀垣(或作耀园),字达景,号星桥,系容闳堂弟。按,星桥为兴中会员,在汉口俄国洋行充买办,参与自立军事。
- ⑪ 孙中山全集。第1卷。198
- ⑫ 有的论者指陈:“容(闳)、郑(观应)、孙(中山)三氏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,彼此之间是相互牵连着”的;“容氏继杨衢云(于1900年在香港被暗杀。——引者按,应是1901年1月10日)之后,由孙逸仙提议,毕永年、谢缙泰、平山周、宫崎寅藏等提名为兴中会的领袖,因为众人认为容氏是“有利于共和国的建立”。容耀园也极力说服,而“容氏则表示他依然会支持兴中会,但婉谢众人的提名。于是孙逸仙成为兴中会的领袖。”(见钟基瑞《郑观应与孙逸仙》,载于高雄中山大学《中山社会科学译粹》季刊第2卷第4期,第191页)此说似乏佐证。
- ⑬ 罗刚。中华民国国父实录。第2册。台北,1988。1237—1238
- ⑭ 据有的学者考证,容闳带往国外购买机器的款项,可能未超过30000两银子,而不是68000两。见:李时岳、胡滨。从闭关到开放。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88。35
- ⑮ 梦山楼。同光风云录。见:容闳传记资料(一)。台北,1979。8
- ⑯ 从闭关到开放。38
- ⑰ 李文忠公全书。朋僚函稿。卷12。26
- ⑱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。卷126。13
- ⑲ 夏东元。郑观应传(修订本)。上海:华东师大出版社,1985。47
- ⑳ 吴相湘。国父、许芹、容闳,民国史纵横谈。48
- ㉑ 何广棧。族谱所载有关容闳之史料。台北:传记文学,第35卷(4),140
- ㉒ 见:郭廷以。近代中国史事日志(上)。北京:中华书局,1987。(据台版影印)各年所记
- ㉓ 高宗鲁编译。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(上)。台湾:传记文学,第34卷(2)。60
- ㉔ 洋务运动(近代史资料丛刊)二。167
- ㉕ 戈公振。中国报学史。北京:三联书店,1986。113、120
- ㉖ 孙中山全集。第2卷。144
- ㉗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。328